

陶淵明集译注

魏正申 著

文津出版社



陶 淵 明 集 译 注

魏正申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205号

陶渊明确集译注
TAOYUANMINGJI YIZHU

魏正申 著

*

文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12000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80554-184-1/I·61

定价: 12.00元

序

钟优民

陶渊明研究历史悠久，若从颜延之《陶征士诔》算起，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六十五年。在这漫长的陶学发展里程上，高潮迭起，如唐代对陶诗的竞相祖述、宋代对陶公的推崇备至、清代于陶作的义理考据等等，都是异彩纷呈、蔚为壮观的盛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陶渊明研究更是历史上罕见的迅速发展时期，据有关资料统计，1977—1990年短短十四年，中国大陆出版陶学专著十六种，论文三百五十六篇，这确实是值得陶学同仁额手称庆的喜事。

在上述专著中，就有魏正申同志的《陶渊明探稿》。承蒙作者惠赠，得以拜读大作，给我留下颇深印象。该著汇集十八篇文章，是作者1961年来研究陶渊明的大部分文稿，很多篇章均在前人论点基础上生发开来，提出个人新解，或补充，或辩证，或驳难，多言之有物，给予了系统而明晰的论

【注】钟优民研究员，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陶学专家、陶学学术史的奠基人，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著述有：《陶渊明论集》、《陶学史话》、《曹植新探》、《谢灵运论稿》、《望乡诗人庾信》、《中国诗歌史·魏晋南北朝卷》（与张松如教授合作）等。

述,不为望风捕影之玄言空谈,不失为治学之正道。令人更为惊喜的是,前不久接正申同志信,告知又一新著《陶渊明集译注》已脱稿,继之寄来新著《前言》和部分底稿,并嘱为其撰序。尽管眼下手头甚紧,还是欣然应允撰序之托。原拟忙过一阵,再写一像样的序,今接正申同志来信,言及出版社已索要有关的书稿云云,只得搁下其他未竟文稿,匆匆提笔,以答前诺。

粗读《陶渊明集译注·前言》与部分底稿,深感作者在陶学上用力之勤,至堪钦佩。为了这部书稿,作者进行了近三十年的资料准备,充分掌握了有关材料。在译注过程中,反复比较善本和近现代注本,在比较中择善而从,在综合中独出新解。经过此番认真钻研,厚积薄发,终成又一部陶渊明研究新著,这是陶学论坛上近期又一颇有份量的创获。由于作者是一位有思想、有功力的严肃学者,故该著确乎别具一格、颇有特色,这就是:

一、著者抓住历代注陶、评陶中“消极隐逸”和“忠愤”说两个重大关键问题的症结点,以科学、公允的态度重新注陶、评陶,从更新的角度切入,一改陶的思想分期三段论或四段论为六段,即从青少年时期“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到二十九岁前确定的“衔觞赋诗,以乐其志”;再从入仕中“脂我名车,策我名骥”的“志彼不舍”到归田后“或植杖而耘耔”、“临清流而赋诗”的“惧负素志”;又由“终晓不能静”、“有志不获骋”而最终找到桃源理想“高举寻吾契”、“斯滥岂攸志”,在王瑶先生首创的为陶集编年论析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掘和补充。

二、著者将陶其人其作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从陶对

政治风云变幻的态度上注陶评陶，著者从淝水之战的胜利带给陶为“大济于苍生”的进取热望和谢安受排斥而不幸辞世后，专一从政志向的改变，将入仕前陶的思想分期作两段处理，较为合情入理。同时，著者还将陶其人其作放在魏晋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中加以理论关照和历史定位，提出了《五柳先生传》所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标志着诗人从事诗文创作的终身志愿，具有较为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见解颇为新颖。

三、著者善于把握陶的思想历程，抓住陶一生中仕与隐的主要矛盾和不同时期矛盾的主导方面所决定的不同足迹与心态，突出陶的“全人”。这样从陶的思想矛盾中分析其思想变迁里程，更易于从深层次揭示其思想的复杂性，有的放矢，言之有物。

四、著者巧妙地抓住陶研中被公认为看法一致的作品，采用类比方法用以鉴别有歧见的作品，使一些作品系年和篇旨论析有据有证，归于陶的思想分期中，令人信服。

五、全书译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普及性。题解与篇义简析结合紧密，条分缕析，时见新意，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不失为一部颇具风趣、引人入胜的古籍译本。

《陶渊明集译注》的特点与成就显然远不止上述五点，仅就管见所及，聊陈如兹。著者正在盛年，今后的陶渊明研究定然更上一层楼，拿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新著呈献读者，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1992年9月12日于长春南湖新村陶斋

前

言

一

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名人，以他独有的思想和人格一直在激励着历代的人们；以他的光辉艺术实践启迪着一代代作家。陶公的诗文为古今众多的读者所钟爱，致使陶渊明热经久不衰，走向世界。

多年来，笔者在学习陶作和各家研陶著述的过程中，有意地做些基础资料的积累，结成了这本陶集通俗、浅白译注的小册子，欲为陶学热做点普及性的工作。本书对陶集中每篇诗文的解析，分为作品系年、题解与篇义简析、译解和注释四部分。

二

阅读文学作品，前提条件是先要弄清其创作年代，以便“知人论世”。很难想象，不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实际能真正理解一篇篇具体的作品，足见作品系年之于

掌握作品的重要性，因此，本书在诗文译注前首先标示出来。

关于陶公的享年，历代有51岁说（如清·吴汝纶《古诗钞》）、52岁说（如古直《陶靖节年谱》）、56岁说（如梁启超《陶渊明年谱》）、59岁说（如邓安生《陶渊明年谱》）、76岁说（如宋代张缙《吴谱辨证》）和63岁说等六种。63岁说影响最大，梁代沈约、萧统，宋代的王质、吴仁杰，清代的顾易、丁晏、陶澍、杨希闵和当代的许多陶学家，多有论析。

王瑶先生于1956年8月编注出版的《陶渊明集》，一改旧本按体裁编排为编年排列，将陶公诗与文分别系于63岁的各年之中，颇多新解，是研陶史上的一大创获，对陶作的深入普及与研究起了莫大的作用。

同时，1956年以后，多次关于陶学的大探讨，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令人瞩目的盛事，继1961年《陶渊明讨论集》问世之后，诸多陶学专家出版专著，在王瑶先生成果的基础上再行探索：

1963年：廖仲安著《陶渊明》。

1971年：杨勇撰《陶渊明集校笺》。

1979年：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

1981年：李华选注《陶渊明诗文选》，吴云著《陶渊明论稿》，钟优民著《陶渊明论集》，唐满先选注《陶渊明诗文选》。

1983年：谷云义编著《陶渊明》，王绍龄编著《陶渊明》。

1984年：方重选译《陶渊明诗文选译》（汉英文对照），徐巍选注《陶渊明诗选》。

1985年：唐满先注《陶渊明集浅注》，王孟白校笺《陶渊明诗文校笺》，陈忠主编《陶渊明研究》（内部发行），吴鹭山著《读陶丛札》。

1986年：李文初著《陶渊明论略》；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刘继才与闵振贵编著《陶渊明诗文译释》。

1987年：陶渊明纪念馆编《陶渊明研究专辑》（内部发行）；徐新杰主编《陶渊明研究》（内部发行）。

1988年：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赏析集》。

1989年：侯爵良与彭华生《陶渊明名篇赏析》。

1990年：陶文鹏与丘万紫选析《陶渊明诗文赏析》；谢先俊与王勋敏译注《陶渊明诗文选译》；魏正申著《陶渊明探稿》。

1991年：王运生纂辑《陶诗及东坡和陶诗评注》；钟优民著《陶学史话》；邓安生著《陶渊明年谱》。【注】

特别是我国当代的三位著名学者、陶学大家钟优民、吴云和李文初先生，集千余年来研陶之大成的专著《陶渊明论集》、《陶渊明论稿》和《陶渊明论略》的问世，对诸如极关系年的“消极隐逸”说、“忠愤”说做出了科学而深邃的论析，开创了陶渊明研究的新局面，使这种探讨更具有进一步深入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笔者有必要简述王瑶先生与诸家在这两个重大观点上的探究历程。

先说“消极隐逸”。王瑶先生认为：陶渊明“正因为对

【注】此外，台湾省也有许多论陶专著，笔者只从有关资料中觅得其目，诸如：李辰冬著《陶渊明评论》；王叔岷著《陶渊明诗笺证稿》；九思丛书编辑部编《陶渊明研究》；方祖棨著《陶渊明》与《陶潜诗笺注校证论评》；宋丘龙著《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与《陶渊明诗》；丁仲祐著《陶潜诗笺注》；刘维崇著《陶渊明评传》；成伟出版社编《陶渊明研究》；王光前编著《陶渊明和他的作品》，等等。痛惜海峡隔阻，其宏论创见，不得其闻。

现实不满，而又无力变革，而且也看不出可以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消极的‘独善其身’的逃避办法，那么由此而自甘寂寞和安于现状，正是由洁身自好的退隐发展下来的必然结果”（《陶渊明集》前言）。

对此，诸多论者提出了不同看法。钟优民先生在《陶渊明论集·陶渊明的咏怀诗》中提出：“对待陶渊明，不能也不该再继续袭用‘隐逸诗人’的旧谱，重蹈‘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的故辙了，这才是我们对待这位古典优秀作家及其光辉作品的公允态度”，“渊明倔强不屈、坚持决裂的反抗行为，虽然不能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相提并论，但他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紧握手中唯一的武器——战斗的笔，随其所见所感，指点时事，激扬文字，嬉笑怒骂，发而为诗，对现实社会的黑暗进行揭露和批判，这就比常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怨愤大大前进一步。‘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九日闲居》），渊明生前就坚决不同意那种认为归隐只是图个人安乐、不能有所作为的观点。在他心目中，自量只要能坚持所选择的道路，也是可以有所作为和贡献的。这个‘成’，似乎主要指他那‘寄怀于言’的诗文，它是渊明坚持斗争、至死不屈的珍贵纪录”。李文初先生在《陶渊明论略·论陶渊明之“隐”》中指出：“陶渊明归隐，实际上只是从官场退隐到农村，并未进而潜入深山老林，与鸟兽同群。从接触现实一面观之，他是从狭小的官场投身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是从上层社会逐渐接近下层社会。在农村中，他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对农村现实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对官场来说，是‘隐’；对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来说，则不但不是‘隐’，反而

是更贴近，更深入了。有人认为，与其说陶渊明‘归隐’，不如说他‘归田’更确切。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吴云先生在《陶渊明诗文赏析集·荣木》中指出：“陶渊明的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建立功业。为此他极珍惜时间。《杂诗》八首其一说：‘盛年不重来，^①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然而他所处的时代政治太黑暗了，每次出仕虽然都是满怀信心，但一碰到黑暗的社会现实之后，他就退下来。退下来以后，他仍旧希望再展抱负，这就是陶渊明一生几仕几隐的根本原因。即使他从41岁就与政界诀别，但仍时刻关心政治，也未忘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猛志固常在’乃是他一生做人的写照。”王廷箴先生在《志是陶渊明的精神支柱》一文中写道：“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的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诗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并与黑暗社会进行抗争。”拙著《陶渊明探稿·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也有言：“陶渊明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在政治上‘欲有为而不能’（《朱子语类》），转而从文，反映他在事业上的积极进取，并非消极隐逸。他用‘独起众类’、‘莫之与京’的诗文写下自己的斗争历程，并采用各种方式有意传世。”

再谈“忠愤”说。王瑶先生不同意“注家过分滞执于他对晋室衰亡的忠愤”（《陶渊明集》前言），而在为《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三诗系年时又写道：“古人咏史，都是托古述怀，并不是论证史实。三诗中二疏取其见机归隐，三良取其与君主同死，荆轲取其为主复仇的侠义精神，而尤钟情于荆轲。三诗诗体既皆相同，内容又互相阐发，当为一

时所作。其中《咏三良》一首当为悼张祚不忍向零陵王进毒酒，而自饮身死一事。因知这三诗都作于永初二年（421）以后；今暂系于宋废帝景平元年癸亥（423），本年陶渊明59岁。”

诸多学人对此提出了异议。钟优民先生在《陶渊明论集·陶渊明的政治倾向》一文中认为，陶渊明的早年“同样具有君臣观念，但并不表现在要充当司马氏王朝的忠顺臣仆上，而表现在对‘圣君贤臣’的政治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上”；不能“把他日后对刘裕的不满和对晋室的所谓‘忠恋’混为一谈”，不能按照“对刘裕的愤懑就等于对晋室的忠诚”这种逻辑进行推理。而“从陶渊明的生活和创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庶族地主对东晋王朝崩溃的冷漠”，就是一些作品中“透露出他对趋附新朝之辈的鄙夷不满和自己决不与刘裕合作的决心”；“并不曾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欲效荆轲为晋复仇、欲效‘三良’为晋殉节等等”，这是“根本不顾陶渊明的本意为何，全由欣赏者主观地妄加取舍”（《陶渊明论集·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李文初先生又在宋代苏轼和明人何孟春探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这三首咏史诗，以往多认为是晋宋易代后的作品。说它们吊古伤今，托意深微，种种附会曲说，不胜枚举。究其根由，概由年号甲子、耻事二姓之说派生而来。此说既破，这些论说也就无从立足了”。《咏二疏》，“赞扬二疏深明功成身退之理。……要突出他们那多财损志、多财益过的非凡见识。诗中并无明显迹象表明是以此自况彭泽归田的。况且，陶渊明的归田性质并不是什么功成身退，他是功名未就便自动拂衣而去的”；《咏三良》，“是借《诗经·黄鸟》本事以表现儒家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

《咏荆轲》，“这首诗中通过荆轲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或精神，却丝毫没有‘忠’的影子。‘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行刺秦王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士为知己者死’之类狭隘报恩观，并未越出司马迁为刺客规定的本质特征。‘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说明荆轲行动的目的还包含着追求个人荣名的考虑。在陶渊明笔下，荆轲是刺客而不是‘忠臣’，陶渊明歌颂的是刺客的意气豪情，而不是‘忠臣’为国君报仇雪恨的壮烈之举。……确实反映了青少年时代陶渊明的虎虎生气；这与他自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气概，不是神韵相仿吗？说《咏荆轲》是他早年的作品，并非无稽之谈”（《陶渊明论略·陶渊明思想分期与陶集诗文系年》）。

况且，把三诗系年于59岁，取其“与君同死”、“为主复仇”的强烈有君论观点，与其系年于57岁的《桃花源诗并记》所标示的无君论思想也相抵牾。钟优民先生在《陶渊明论集·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中指出：陶渊明“以一个成熟的思想家的面貌站在历史的前列，认真地探索人类美好的未来，关心社会民生，是思想上的巨大进步和转变。《桃花源记》的创作就是这种进步与转变的标志。……接受阮、鲍等人的无君论的影响，进而在自己的创作上表现出来”。

拙著《陶渊明探稿·〈拟古〉诗九首探究》也有言：“陶渊明晚年形成了以桃源理想为主要标志的桃源思想，从企慕明君、有君臣观念转到无君论的立场，并以桃源思想的新高度，衡量历史，面对现实，以无君论思想为武器批判封建统治者。……就是诗人感慨刘裕夺权过程中施展的种种阴谋手段，连《述酒》的‘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也是对惨杀的不平静，

不是对东晋政治上的同情，实质性问题是批判人与人之间互相残害的君权社会。如果说诗人有同情，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从小人道主义角度同情一个弱者而已。”

至于王瑶先生系年于陶公58岁的《读〈山海经〉十三首》，逯钦立先生系年于陶公44岁之前（见其校注的《陶渊明集》），刘禹昌先生认为是“43至44岁时所作”（见其《陶渊明作品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文初先生也指出“当属归田前期的作品”，颇为论家赞同，兹不赘述。

同时，李文初先生还在《陶渊明思想与陶集诗文系年》中谈了更好地为陶集系年的意见，值得重视：

要真正研究一个作家，首先弄清他的作品的创作年月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否则，首尾倒置，随意征引，那就必然造成极大的混乱，得出荒唐可笑的结论。我认为，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

第一，根据现有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首先列出那些能够确实系年的作品。

第二，将其余目前尚难具体系年的作品从各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尽量将它们分别归入某一时间范围内，使这些作品从总体上看仍有一个时间先后的概念，不致造成全面的混乱。具体做法是：根据目前能具体系年的作品及其他有关材料，准确划分作家的思想分期，并把握每个时期的思想特点，然后再来观察那些难以系年的作品，大体上将它们归入某个思想发展时期，一般说还是可能办到的。

本书也持63岁说观点，以陶公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为确。笔者欲按李文初先生指出的方法，以王瑶先生编注的《陶渊明集》的系

年为基本依据，按陶公生平事迹与思想历程，将其全部诗文按六编依年统排编次：

第一编 居田前期：积极追求建功立业理想时期的作品（公元379年至384年，15岁至20岁）。有诗5首。

第二编 居田后期：从政与从文双重志愿确立时期的作品（公元385年至392年，21岁至28岁）。有诗4首，文4篇。

第三编 时仕时归：心怀两端时期的作品（公元393年至405年，29岁至41岁）。有诗27首，文2篇。

第四编 归田前期：田园追求时期的作品（公元406年至413年，42岁至49岁）。有诗34首，文2篇。

第五编 归田中期：生活道路反思时期的作品（公元414年至420年，50岁至56岁）。有诗36首，文2篇。

第六编 归田后期：桃源思想形成时期的作品（公元421年至427年，57岁至63岁）。有诗19首，文2篇。

三

关于题解与篇义简析。诗文的题目为全诗全文的标识和眉目，如同作者亮出的指示灯，要读者首先去感知它一样。因此，没有一位作家不精心为之的。笔者经过反复推敲认识到，陶公的诗文，多以表现其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态度为主，而表现为隐曲风格的诗文又不少，因此在题目设计上独运匠心，颇讲功力，有好多诗文读者不着力研讨其篇目是很难理会全篇的。笔者将陶集中125首诗、12篇文的标题，从突现作者思想倾向的方式上大体归纳为五种类型：

1. 结合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即事抒情或借景抒情。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游斜川》等。

2. 点明主旨、篇义，直抒胸臆。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感士不遇赋》等。

3. 借古述今，信笔致慨。如《读史述九章》、《咏二疏》等。

4. 托言飞鸟等动物（如《归鸟》）、“我”化的人物（如《五柳先生传》）等暗喻情志与理想。

5. 提示特征、疑点，或点出“酒”字，曲笔写时事和其它敏感性问题，表明政治态度和有关看法。如《述酒》、《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等。这后三类题目是尤应精思细虑的。

本书将题解与篇义简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和于陶公的历史时代、切身经历、实际思想与总体艺术表现中。简明地提示各篇的主旨及其所揭示的诗人的思想，必要时略加分析，从而找寻这一篇中的陶公的足迹和心态，以达认识陶公之“全人”的目的。

本书的译解以清代陶澍注《靖节先生集》（1956年8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线装本）为底本，并着意比较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1979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参照其它各本，择善而从。采用文白对应译解的方法进行直译，即将陶集中一篇篇诗文按句分行列于左，同时对应地将其译解列于右，进行文白对照。因为是译解，即解释性译文，力图明了通俗，不追求句式整齐和谐韵。

有关注释，词语释义力争简明易懂，难字注音；引事据典一般用现代汉语，凡有文言均简作译释。书末附有《陶渊明年表》、《陶渊明一生居处一览表》、《陶学书目》（1911—1991年）、《本书与四部陶集编年集注诗文系年对照表》，

以资查阅对照。另外，本书为笔者陶渊明系列研究之二，《陶渊明探稿》已于1990年由北京文津出版社出版，为便于读者了解笔者的述陶观点，附录我国著名的陶学专家、《江西社会科学》副编审李华先生的书评《一部有特色的研陶新作——喜读〈陶渊明探稿〉》。多年来，笔者承蒙逯钦立先生生前谆谆教诲，对逯老论陶注陶成果也多有取鉴，特附“当代著名学者有关逯钦立先生研陶的评述摘录”，以代言师恩永记之意，缅怀英灵之情。

本书承蒙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陶学专家、陶学史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钟优民先生赐序，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和采用了有关注本与论著，吸取了古代和当代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这里就不一一注明了。【注】在此谨向这些学者致谢！

著名的陶学家萧望卿先生曾经说过：“真正好的诗所蕴含的美，好像是永不枯竭的源泉。一个人、一个时代，要把它发掘净尽，恐怕是不可能的。”（见北京师范学院李华先生主编《陶渊明诗文赏析集》）一首诗尚且如此，何况是全集了。可见就是笔者在此书中所寻求的点滴之想也未必令人称心，错漏之处一定不少，特别是笔者水平有限，诚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魏正申

【注】据张驰、陈忠《中国大陆（1921—1990）发表出版陶渊明研究成果的特点》统计，“‘五四运动’后，中国现代的陶学研究”，“对中国传统陶学的‘诗话和评点模式’的突破”后70年间，有24家出版社出版了30位作者的32部专著，307家报刊刊载了537位作者的702篇论文。